

全面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茶业统制的困境与转向——以浙江国统区为例

单洋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杭州, 311121;

摘要: 全面抗战中后期, 随着战争局势的恶化, 茶叶生产困顿、外销停滞, 浙江茶业遭遇重创, 战时茶业统制陷入困境。面对茶价暴跌、米价飞涨且国统区内的救济措施收效甚微的局面, 茶农纷纷砍伐茶树改种粮食。由此, 国民政府发起茶树更新运动, 预备为战后茶业复兴创造基础。然而, 由于经费短缺、办公效率低下以及茶农配合度不高等多方原因, 浙江国统区内的茶树更新运动效果有限。此外, 外销中断、存茶过多等因素加剧了中国茶叶公司的经营困境, 其主营业务被迫从外销转为内销。但由于此时国民政府已经为开拓国内市场而放弃了对内销茶叶的统制, 中国茶叶公司最终在无力面对市场竞争的状况下, 因财务困顿被不断缩减规模, 乃至被裁撤归并。

关键词: 全面抗战时期; 茶业统制; 浙江国统区

DOI: 10.69979/3029-2700.25.05.090

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 国民政府为适应战时需求, 采取了统制经济政策, 将茶业纳入统制范围, 使 1938—1939 年间茶叶“出口数额超出往年甚多”, “为中央换取外汇的数字在全国农产品出口数字中首屈一指”。^[1] 其中, 浙江省政府积极配合中央落实了茶业统制政策, 省内茶叶出口量较之先前有着显著增加, 为增强抗战力量做出较大的贡献。然而, 进入全面抗战中后期, 由于战争形势的恶化, 以及因此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战时茶业统制最终举步维艰。本文以浙江国统区为例, 考察全面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茶业统制的困境与转向, 分析统制经济政策在抗战中的作用与局限。

1 迫使茶业统制剧变的战争局势

1940 年 1 月, 驻守杭州的日军发动钱江战役, 打破了中日双方军队已持续两年多的隔江对峙状态。浙东门户大开, 浙江正面战场的形势愈加严峻。此后日军不断制造侵略态势, 导致 1940 年度浙江茶叶的产量及出口量明显少于前两年, 使茶业统制政策效果逐步转衰。1941 年 4 月爆发的宁绍战役, 则成为浙江茶业急剧衰落的转折点。此时正值茶季, 日军侵袭沿海各地, 使部分茶区茶事停顿, 无人收买毛茶, 导致价格进一步大跌, 同时米价疯狂暴涨, 如平水茶区出现“米价每担值 200 多元, 而茶价每担竟惨跌至 8 元, 最高亦不过 30 元左右”。

^[2] 据统计, 1938 至 1941 年, 平水茶区茶价由平均每担 21 元涨至 50 元, 涨幅 238.09% (其中 1940 年曾涨至 58

元, 涨幅 276.14%) ; 而米价则由平均每担 12 元直线涨至 200 元, 涨幅高达 1666.66%。^[3]

由此, 经过多方呼吁, 贸易委员会浙江办事处、中国茶叶公司浙江办事处会同中国银行设法“为茶农合作社谋出路”, 在浙江各主要茶区共设立 16 个合作社毛茶集中处, 开展核定各县合作社毛茶数量和贷款的工作, 最终共收集各社已登记的毛茶 24704.5 担以上, 并按照评定价格发放七成贷款, 共计 909869.5 元以上。^[4] 剩余三成余款, 计划等到茶叶集中完毕, 交予收茶部门接收后补清。但是, 平水茶区各县合作社毛茶集中处的茶叶, 按照核定数收茶付贷后, 却因日军流窜嵊县而损失大半。随后, 由于浙江沿海各县相继沦陷, “收购及贷款机关相继撤退, 以致茶价每担虽降至 20 余元, 仍无人问津。”^[5] “整个的平水区, 已陷在敌寇铁蹄下, 茶农们除了受生活的压迫外, 更要受敌人的蹂躏。”^[6]

随着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日军封锁中国沿海口岸, 茶叶外销基本停止, “东南茶区之外销箱茶以前数年收购而未及运出者, 积存茶区达百万箱之巨”。^[7] 各地茶园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荒芜景象, 大量合作社茶厂设备遭到日伪的破坏。茶农“不事整理, 并将茶园土改种间作物, 以图一时之小利, 从此茶树益形衰弱”。^[8] 特别是在平水茶区, “可以改植杂粮的地区, 茶农们早已把茶树砍去, 改种了杂粮; 那无法改种的山地上, 茶芽出了没人去料理”。^[9] 由此, 茶业前途渺茫, 茶业统制遭遇困境。

2 茶树更新运动的艰难推行

1942 年 5 月起, 由于考虑到全面抗战后期“茶农因受生活压迫, 恐将砍伐茶树, 如弃置不问, 茶叶生产势将锐减, 影响战后外销, 情形严重”, 同时全国各地茶树已经“大都呈衰老现象, 枝条丛生, 鲜叶不茂”,^[10]茶树更新运动应运而生, 计划在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南五省各主要茶区开始逐步推行, 试图通过抗战后期茶叶滞销的时机, 采取相关措施指导茶农科学地砍伐、改造衰老茶树。这一措施的当下好处, 是可以使茶园未遭受毁灭性破坏的同时, 茶农们还能在茶园中种植粮食作物, 以应对战时的饥荒。而该运动设定的最终目标是为战后茶业的复兴创造基础。

茶树更新运动在各省具体推行的时间, 根据其实际情况略有不同。浙江茶区方面, 由于深陷于浙赣战役而难以在第一时间开展。直至 1942 年冬, 茶树更新运动才开始在浙江茶区内逐步推行, 主要实施范围仅限遂淳区的淳安、遂安、开化三县和温州区的永嘉、平阳、瑞安、乐清四县, 最终在 1945 年初宣告办理结束。两年间, 浙江茶区开展的茶树更新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共计更新茶园面积达到 10700 亩。^[11]但其间, 在以下三点主要因素的影响下, 茶树更新运动未能取得更大的成果:

第一, 资金严重不足是关键因素。“中茶公司原拟筹拨 300 万元, 充更新休闲补助经费, 嗣以东南战事影响, 减为 80 万元”,^[12]而这些资金“较之其整个业务费之支出, 尚不及百一”。^[13]实际上, 分配给浙江省两个茶区的茶树更新工作站经费(含行政费、补助及奖励费)共计 9.5 万元, 其中温州 5 万元、遂淳 4.5 万元, 仅仅占了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全部经费 66 万元的 14%。^[14]

第二, 由于资金不足的问题, 茶树更新站工作人员办公效率不佳。“各站行政费均感不敷, 职员俸薪占行政费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办公旅费颇感拮据”, 同时由于“行政费由各站主管机关转发, 拖延时日不能按时汇到, 工作上倍受牵制。”各站工作人员大多是由当地茶叶改进机关的职员兼任, “因有本身工作, 兼顾为难, 不能及时工作”, 且“工作站人员待遇较低, 又以未列入省预算内, 公粮无着, 生活不易维持。”^[15]

第三, 茶农配合程度不高。其原因在于三点: 一是在茶树更新运动实施初期, 茶农担心政府抽税或将茶叶

收归公有, 或强迫低价收购其茶叶, 从而观望不前; 二是因补助费太少, 不敷更新费用, 更新后又苦无力管理, “一部分茶农以求食不遑, 对更新工作不感兴趣, 一部分茶农已登记而放弃补助费”; 三是因时局影响, 茶业前景不佳, 茶农放弃采摘, 对茶树更新不加重视。^[16]

3 中国茶叶公司的转型与衰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中国茶叶公司因收购后而未运出的“所有茶叶积存各地达 70 余万箱”,^[17]便以存茶内销为其主要业务。但由于在 1942 年 2 月后, 国民政府为开拓国内市场, 宣布“内销茶停征平衡费”, 准许商民可将销售茶叶“免领运销证通行全国及沦陷区域”, 以及准许“外销茶改充内销, 有须先行出口再转入沦陷区或内地”等政策的出台,^[18]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中茶公司“虽拥有半官式之后盾, 在一般行为上, 微有便利, 然既位与其他茶庄等, 徒有若干陈年外销箱茶, 勉加复制改装成为内销, 而无足以应市之名茶等类, 独沽一味, 难与人争”。^[19]因此, 中国茶叶公司经营内销茶叶始终困难重重, 造成了其在全面抗战后期财务困顿的窘境。为了节省开支、降低经营成本, 贸易委员会将“中茶总公司经费, 依事实需要, 力求缩减, 浙、赣、皖、闽各分公司经费, 亦各减百分之四十。”^[20]

1945 年 3 月 28 日, 财政部宣布中国茶叶公司于 4 月 1 日起裁撤, 其业务、人员及资金归并复兴商业公司, 该公司在其业务处内增设第七组办理原中茶公司的业务。浙江地方银行立即于 4 月 11 日致电复兴公司, 称“中茶公司浙江办事处前欠本行龙泉分行青铅(卖)押借款, 本息截至本年应共计国币 4096160.91 元”, “(中茶)公司前项债务自应由贵公司继续负责办理。”^[21]5 月 9 日, 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同样以要求支付欠款为由致电复兴公司, 称中茶公司浙江办事处“透支国币 500 万元, 截至本年 3 月 31 日止, 计本息 6208249.36 元”。^[22]

对于银行欠款累累外, 中国茶叶公司拖欠茶农、茶商的茶款长期未予以偿清。全面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于 1945 年 10 月决议正式取消统购统销政策, 撤销贸易委员会, 紧缩复兴商业公司并定于年底结束运作。当月, 浙江全省茶联会宁绍台茶叶办事处主任袁雄杰电请嵊县政府代电省政府, 称“中国茶叶公司积欠本区 1940 年度茶款尾款 80 余万元, 迭经电请清发, 迄今未奉示覆, 亦未曾派员来区发放。现值抗战全面胜利, 久陷于

敌伪压迫下之平水区各县茶农茶商已饥寒煎迫、困苦万状，亟待救济。为特电请钧府迅予转电省政府咨电中茶公司，速即派员携款来区清发以维茶农生计。”^[23]而此前，浙江省政府秘书处就曾报告，1941年浙东战役发生时，平水茶区“因上年中茶公司积欠茶款过多，农商大多无法续业，产量本已减少，事变时正当茶季，更致影响，据调查不过上年产量之六七成”。^[24]

4 结语

在全面抗战时期，动员一切人力、物力，集中一切力量于抗战，是中国的根本要求。作为中国重要的茶叶产区，当时浙江国统区能够配合中央积极落实相关政策的意义重大，为国家换取外汇与战略物资、增强抗战经济力量做出了贡献。然而，进入全面抗战中后期，浙江正面战场的形势日益严峻，茶叶生产与流通困难乃至停滞，茶业统制被迫发生转向。在生产方面，茶树更新运动的效果因战时资金不足而差强人意；在销售方面，中国茶叶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走向衰败，茶业统制已举步维艰。纵观全面抗战中后期浙江国统区茶业统制困境与转向，其中不仅反映了浙江茶业在战时国民经济艰难环境下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而且揭示了战时经济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种种具体的矛盾与问题。

参考文献

- [1] 吴觉农：《抗战与茶业改造》，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1945年版，第109页。
- [2] 周英：《平水区的茶农生活与农贷》，《中国农村》第8卷第7期，1942年10月，第16页。
- [3] 《平水婺源二茶区茶价米价统计》，叶知水：《近十年来中国之茶业》，《中农月刊》第5卷第5、6期合刊，1944年6月，第123页。
- [4] 屠绍桢、厉菊仪：《浙江省茶业合作事业概况》，《浙江经济月刊》第4卷第6期，1948年6月，第6页。
- [5] 《救济浙平水茶农，中行贷款百万元》，《大公报（桂林）》1941年8月9日，第4版。
- [6] 周英：《平水区的茶农生活与农贷》，《中国农村》第8卷第7期，1942年10月，第16页。
- [7] 叶知水：《近十年来中国之茶业》，《中农月刊》第5卷第5、6期合刊，1944年6月，第130页。

- [8] 徐受谦：《全国茶区应利用茶叶滞销时期复兴茶园之刍议》，《修农》第30-31期，1942年1月，第24页。
- [9] 周英：《平水区的茶农生活与农贷》，《中国农村》第8卷第7期，1942年10月，第16页。
- [10] 《中茶公司推动茶树更新运动》，《贸易月刊》第3卷第11期，1942年6月，第80页。
- [11] 《浙江省农业改进所八年来工作报告》，《浙江农业》第59、60期合刊，1946年2月，第17页。
- [12] 刘楠楠选辑：《财政部贸易委员会1942年工作报告（下）》，《民国档案》2017年第4期。
- [13] 吴觉农：《三年来茶树更新工作之检讨》，《茶叶研究》第3卷第4、5、6期合刊，1945年，第1页。
- [14] 《三十一年度各省茶树更新经费分配表》，刘楠楠选辑：《财政部贸易委员会1942年工作报告（下）》，《民国档案》2017年第4期。
- [15]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代电》（1944年4月1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L067-004-1362。
- [16] 《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代电》（1944年4月1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L067-004-1362。
- [17] 方云选辑：《1943年中茶公司第三届历次董监会议记录节选》，《民国档案》2018年第1期。
- [18] 刘楠楠选辑：《财政部贸易委员会1942年工作报告（上）》，《民国档案》2017年第3期。
- [19] 方云选辑：《1943年中茶公司第三届历次董监会议记录节选》，《民国档案》2018年第1期。
- [20] 刘楠楠选辑：《财政部贸易委员会1942年工作报告（上）》，《民国档案》2017年第3期。
- [21] 《浙地行急电》（1945年4月1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L068-006-0315。
- [22] 《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函》（1945年5月9日），浙江省档案馆藏，L068-006-0335。
- [23] 《嵊县政府代电（建字第385号）》（1945年10月24日），浙江省档案馆藏，L029-005-0434。
- [24] 李立民：《浙江省三十年秘书处报告》，浙江省政府秘书处，1941年版，第5页。

作者简介：单洋（1996-），男，汉族，浙江宁波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史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